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中的非洲殖民谱系

The Victorian Colonial Genealogy of Africa in English Literature

李长亭 (Li Changting)

内容摘要: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在非洲进行的殖民活动在英国殖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殖民进程及对殖民活动的态度。本文运用谱系学方法梳理出英帝国在维多利亚时期的非洲殖民掠夺和扩张的历史发展进程, 并通过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殖民现象进行研究, 试图勾勒出英国的殖民路线图, 建立起一个清晰的非洲殖民谱系, 探讨不同作者对非洲殖民的态度, 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社会态度。

关键词: 维多利亚; 文学; 非洲; 殖民谱系

作者简介: 李长亭, 文学博士, 南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系作者主持的 201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叙事研究”(17BWW08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The Victorian Colonial Genealogy of Africa in English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Britain Colony in Africa during Victoria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Colonial history. The literature of this period objectively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and the attitudes towards the colony.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trace the colonial invasion and expansion of Britain in Africa by employing Genealogy and study the colonial narration in literature for the purpose of drawing the colonial map, thus establishing a clear colonial genealogy in Africa and exploring the different views to the colony, which is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society and attitudes towards it.

Key words: Victorian; literature; Africa; colonial genealogy

Author: Li Changting, Ph. D., is Professor of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473061,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lct66385@163.com).

引言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在英国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是英国建立

海外殖民地、疯狂进行殖民掠夺、建立起“日不落帝国”的重要时期。对外殖民除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外，对文学领域也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英国很多作家在作品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殖民过程。作为时代的镜像，这些作品运用想象和记录的方式艺术地再现了英国在殖民地的殖民活动，体现出作者本人的殖民观点和价值评判。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解读，我们可以勾勒出英国的非洲殖民路线图，管窥到殖民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从而在文学层面建立起清晰的殖民谱系。

一、文学中的殖民行为

在英国发展史上，对外殖民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英殖民者在殖民过程中除通过武力征服外，还从理论层面为其殖民掠夺寻找合适的借口，企图使殖民行为合理化，从而为野蛮行径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人类不同的种族都有共同的祖先，因此，人性应该是一致的。但随着社会学和人种学或者说民族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种族间的差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等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运用到社会学领域，把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原则移植到社会学和人种学理论中，认为种族之间是有优劣之分的，白人是当然的优等种族，黑人则是劣等种族。这就从理论层面支持了西方殖民者的论调，即白人对黑人的文明教化是促进整个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进化社会学甚至认为，如果说非洲土著也算人类或者说属于人类不同分支的话，那他们也是一支低等的种群，与大猩猩等动物一样野蛮愚昧，对高等种群的影响无动于衷。人类通过从野蛮、蒙昧到文明等不同的进化阶段，最后证明非洲土著处于人类发展的低级阶段。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 1834-1913）甚至声称，非洲土著社会的野蛮状态不是代表了而是低于人类进化的起点，因为人类最初的原始状态包含着进步的因素，而非洲土著社会没有任何进步因素，从进化程度来讲，他们要低于人类的祖先。因此，他们必须置于帝国的监管之下，只能作为潜在的劳动力使用（Lubbock 1-2）。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 1858-1916）指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通过实施一些不亚于战争影响的律法，除掉了那些与之抗争的劣等民族。仅仅通过互相接触，劣等民族就可在优等民族前消失……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凭着其内部的文明力量逐渐开发其领地的自然资源，其结果不言自明。同样的历史也在南部非洲重演，用当地殖民者的话说，土著要么必须离开，要么就必须在我们准备开发的土地上辛勤劳作”（Kidd 49-50）。理查德·波顿（Richard Burton, 1821-1890）认为，非洲人“不如思维活跃、凡事讲究客观的欧洲人，也不如主观且善于思考的亚洲人。他们具备了低等的东方人的大部分特征——思维迟钝、行为懒惰、道德低下、迷信且易于冲动”（Burton, *The Lake Regions* 326）。他把土著人的信仰崇拜看作是巫术和邪恶

崇拜。除波顿之外，还有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都认为土著人的崇拜仪式是黑暗的、超验的，完全是在荼毒心灵。在他们的作品中，非洲的国王被降格为“头领”(chief)，所有的非洲神父也都被称为“巫医”(witch doctor)(Burton, *The Lake Regions* 347-48)。波顿认为，野蛮人是需要文明者来领导的，“广袤的热带地区仍旧需要劣等种族的人来清理和打扫，这样才能适合文明人来落脚”(Burton, *Two Trips* 311)。还有人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来自工业化国家的管理和统治，非洲确定无疑地要沦落到懒惰和野蛮的地步”(Bakery 211)。以上这些观点和言论代表了英国社会对非洲进行殖民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作为对这些观点的呼应，赖德·哈格特(Rider Haggard, 1856-1925)的《所罗门国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 1885)描述了非洲一个小国的国王在白人探险者的帮助下，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夺回被其叔父篡夺的王位的经过。小说赞美了西方文明的智慧和强大，同时也表明非洲需要白人的帮助和教化，文明常常是和野蛮交织在一起，而野蛮是要被消除掉的，文明注定要战胜野蛮，非洲这块黑暗的大陆必须要有西方文明的使者带来光明来驱除黑暗。不过，《所罗门国王的宝藏》也揭露了白人给当地带来的破坏，并比较了原始风俗与文明间的区别和优劣，认为文明和野蛮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太阳能和黑暗或者说白人能和黑人为伍吗？”(Haggard 241)

白人深入黑暗深处既证明了白人对黑人领地的入侵，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人类进化的高级阶段。白人开始从黑人的“野蛮风俗”中汲取对他们有用的成分。曾代表英国在非洲加纳进行殖民管理的托马斯·伯蒂奇(Thomas Edward Bowdich, 1791-1824)在其回忆录《从海岸角城堡到阿散蒂的使命》(*Mission from Cape Coast Castle to Ashantee*, 1819)中谴责了阿散蒂人用活人来祭祀的习俗，但他并不认为这些就能代表这个种族的所有文化，而且这也没有影响他接受他们的艺术、制度及风俗文化。

领土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生活模式和制度化的国家物理表现形式，反映出国民的身份归属和政治地位。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殖民行为结束之前，英国的绝大部分无产者并没有生活在英国本土，而是生活在英国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英国民众并没有生活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随着奴隶贸易的进一步开展，殖民者需要更准确细致地了解非洲和土著，这包括与他们进行贸易的非洲商人和那些成为商品的非洲人。由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西方冒险家、商人以及各种打着传播文明旗号的使者蜂拥至这块“黑暗的中心”(康拉德，《黑暗的心》4)，这里“野蛮的风俗”(康拉德，《黑暗的心》64)日渐被帝国的意识形态以文明的名义所取代。

在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1902)中，叙事者马洛评论说，非洲曾经是他地图上梦想到达的地方，可

如今在西方殖民者的巧取豪夺之下已不再是一块空白之地：“对土地的征服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从与我们肤色、长相不一样的人手中夺过来，这不是什么好事，能够补救的只是理想而已”（康拉德，《黑暗的心》6）。这些土地“如今成了黑暗的地方”（康拉德，《黑暗的心》8）。康拉德“认为英国的历史发生在海外。他虽然是法律意义上的英国公民，但他在英国从没有‘家’的感觉，他也没有在英国添置房产作为归属的象征”（George 75）。

在19世纪60年代，随着英帝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加之种族论和进化论在社会科学领域日益交汇，人们普遍认为非洲需要在伦理、宗教以及科学方面实施帝国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关于种族主义历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最后却失败了。根据1833年的解放法案，黑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在英国人的心目中，他们无论在思想、道德还是在身体方面依旧还是奴隶”（Stepan 1）。英帝国对非洲从赤裸裸的领土占领变成了改头换面的文化殖民，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依旧存在。第一批的废奴主义者把奴隶买卖归咎于欧洲殖民者，但到了19世纪中期，奴隶买卖的根源却被转移到了非洲。这种转移充斥着对非洲食人习俗、淫乱、巫术等的描写，使维多利亚时期非洲的黑暗成为人们的共识。他们有责任对这个落后、黑暗的大陆进行文明教化，而作家更有义务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的作品《探险家》（*The Explorer*, 1909）中的主人公亚力克（Alec）读到“在非洲探险的辉煌业绩”后，他的“血液里激荡着那些描写带来的魔力”。受到这些描写的影响，他也成为了一名探险者，努力与一些野蛮行径和奴隶贸易作斗争，支持帝国的扩张。毛姆的作品生动地刻画了一幅在非洲探险的群英谱，“他们一点一点地建立起帝国”，他们的理想就是“在女王的皇冠上再添一颗耀眼的钻石”（Maugham 45）。“亚力克长期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奴隶主被他们从比英国领土大得多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并与获得独立的土著头领签订了合约……但只保留一个要求，那就是政府应该附加一条：被征服的土地归帝国所有”（Maugham 175-76）。另外，还有许多作家对食人族的传说很感兴趣。据说食人（cannibal）一词起源于西班牙语中的兽性（Canibales）一词，它是加勒比人（Caribes）这个名称的一种形式，是哥伦布环球航行时发现加勒比群岛上的居民有吃人的传统，于是把加勒比人称作食人族。（雅各比 30）但人类学家不能确定是否真实存在食人习俗还是由西方的探险家或传教士们想象出来的。而后殖民的人类学家们则认为并不存在什么食人习俗，它是由西方的传教士们和探险家们“虚构”出来的。还有研究者认为：“食人者不一定很凶残，他吞食同类不是因为恨他们，而是因为喜欢他们”（Reader 54）。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指出：“拥有语言就拥有了语言所表达和暗示的世界……对语言的掌控就能具备超乎寻常的力量”（Fanon 18）。维多利亚时期的帝国主义既创造了殖民话语，同时也垄断了话语霸权，非洲被剥夺

了语言表达的权力，成为欧洲殖民者可以随意描摹的对象。“在库尔茨的所有才能当中，最为突出的一点，表现出他才能的真实存在的一点，是他说话的本领，他的言谈”（康拉德，《黑暗的心》60）。代表西方文明的《圣经》可以被翻译成无数的非洲语言，但殖民者很少把非洲语言翻译出去。就像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对非洲土著描写的那样，他们在西方的霸权话语面前处于失语状态，不能清楚地用母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只会在喉管中发出咿咿呀呀的混响。这些作品也因此成为反映当时非洲殖民的镜像和载体。

二、文学中的废奴运动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一些文学作品表现出了对非洲的同情。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的启蒙思想认为，人们无论肤色或种族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是奴隶贸易日益遭到社会的反对，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掀起了废奴运动的热潮。这期间出现了很多有关废奴的文学作品。“在关于非洲的文学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对废奴的宣传”（Brantlinger 175）。废奴文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揭露奴隶制的残暴行径；二是对非洲进行自由、愉快的想象性写作。欧洲殖民者给非洲这个人种的伊甸园带来的文明成果是贪婪、杀戮、战争、欺骗和奴隶制，奴隶被殴打致死的实例在文学中比比皆是。早在浪漫主义时期，丧失人性的奴隶贸易就笼罩着整个非洲大陆。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奴隶贸易给黑人这一种族带来的灾难和屈辱，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呼吁社会给予黑人平等的生存权。很多作家也在作品中表达了对黑人奴隶的同情和对废除奴隶制的支持。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在《序曲》（*The Prelude*, 1850）中曾赞扬1792年有人在议会中提出但没有通过的废止贩卖奴隶的议案。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诗歌“小黑孩儿”（“The Little Black Boy”, 1789）也许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妈妈生我在南方的荒野，\我虽是黑人，但灵魂雪白！\英国孩子白得像天使，\但我黑，好像失去了光彩。（Blake 9）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 1774-1843）在“致恐怖”（“To Horror”）的最后一节中写道：恐怖！我再一次称呼你！\带我到该诅咒的海际，\在那里黑人争斗不休（Southey 2: 129）。此外，还有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的“希腊奴隶贸易颂歌”（“Greek Ode on the Slave Trade”, 1792）以及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和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的十四行诗。他们都揭露了奴隶制的残暴行径，抨击当时的奴隶贸易制度。另外，我们也可以在一个世纪之后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中听到殖民者库尔茨（Kurtz）的临终呼喊：“恐怖呀！恐怖！”。骚塞在关于奴隶贸易的诗作中想象着奴隶们打碎了欧洲殖民者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过着幸福的田园生活：不能容忍地想到\过去的欢乐；家乡的果园，\友谊的至乐，自由和爱恋\永远离开了怀抱（Southey 257）。作者运用轻松

的笔调回忆起黑人昔日的快乐时光，揭露了白人强加在黑人奴隶身上的痛苦和磨难。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审视的虽是异域文化，但最终却是对英国本土文化的批判。他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差异却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在作品中暴露出的“恐怖”。他“把文明、道德上可忍耐的人类生活视为在薄薄的、还未完全冷却下来的熔岩上散步，它随时都可破裂，让那些不小心的人们跌入可怕的深渊”（Russell 82）。

从废奴运动到西方列强在 19 世纪末对非洲瓜分完毕，英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对非洲神秘化的倾向。我们可以运用福柯的谱系化语言来描述废奴运动、西方文明传播与非洲原始野蛮行为间的联系。在西方人看来，社会上可能存在很多不同的进化阶段和奇怪的风俗仪式，但只有一种文明、一种进化途径和一种宗教是值得发扬和传播的。这些都包涵在全部的殖民话语体系中。在此体系中，被殖民者丧失了话语权，几乎完全处于失语状态。这就是福柯谱系学的一个功能，即对各种各样的征服系统进行分析：它们不是知识的先决力量，而是知识中心化的可怕游戏（Foucault 148）。不过这里存在着悖论，因为废奴运动本身就隐含着帝国的魅影，它不是纯粹的利他行为，而是英帝国在非洲立足的经济条件。英帝国是在奴隶贸易为其工业化提供了足够的资本之后才提出废奴主张的。美国的独立动摇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地位使其失去了大量的殖民地。为了保住世界工业大国的地位，英国的废奴运动其实也是遏制其对手在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经济中获利的手段。

英国在自己的领地废除奴隶贸易后开始把自己视为非洲的救世主。这明显地表现在 1841 年尼日尔河探险中。这次探险旨在向西非传播基督教和“合法商品”，在非洲发展工业，开展自由贸易。这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在西非推动占领政策的第一步”（Curtin 298）。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 1852）中抨击了这种虚伪的慈善行为。他把凯蒂·杰里白（Caddy Jellyby）夫人的任务安排在尼日尔河岸上，以此暗示其工作就像尼日尔探险一样荒谬和劳而无功。他称这些探险者是“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们离开过的地方变得比他们发现时的样子还要糟糕”。但狄更斯本人也是种族主义者，他认为非洲是一块不适合文明传播的土地，只能停留在黑暗之中。“国内的工作一定要认真对待，而国外则无任何希望”（Dickens 337-39）。无独有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都认为，废奴运动和尼日尔远征等都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其实应该把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如何治理国内的贫困以及政府的失策方面。实际上，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都同情本国的穷人，却对受剥削和迫害的非洲奴隶无动于衷，甚至还有许多人支持美国内战中的南方种植园奴隶主。不过，从 19 世纪 40 年代一直到世纪末，奴隶制一直是人们谈论的重点话题，当《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1852）于 1852 年面世时，其在英国的销量就超过了在美国的销量。（Curtin 328）英国著名

诗人布朗宁夫人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1806-1861) 十分崇拜小说作者斯托夫人 (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 并创作了《逃跑的奴隶》(*The Runaway Slave at Pilgrim's Point*, 1846) 来反对奴隶制, 呼吁社会给予奴隶人身自由。康拉德对所谓食人族的颠覆式描写反倒暴露出殖民者的野蛮和残暴, 同时也暗示了所谓的食人族可能并不存在, 它只是殖民者的想象而已。与殖民者相比, 主人公马洛 (Marlow) 在处于饥饿状态的食人族身上发现了超乎寻常的克制力: “克制! 这可能是一种什么克制呢? 这是迷信、厌恶、忍耐、恐惧——或者是某种原始的自尊心? 没有哪一种恐惧顶得住饥饿, 没有哪一种耐力熬得过饥饿, 厌恶不存在于饥饿存在的地方, 至于说迷信、信仰, 或者什么你们不妨称之为原则的东西, 还不如微风中的一把稻草呢” (康拉德, 《黑暗的心》53)。马洛高度评价了这些所谓食人族的克制力。相反, 倒是殖民者的代表库尔茨更像是食人者: “他咧开大嘴——这使他的面貌显得不可思议地贪婪, 好像他要吞掉整个天空, 整个大地, 和所有他面前的人” (康拉德, 《黑暗的心》77)。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Voltaire, 1694-1778) 指出: “在所有的宗教之中, 基督教当然会激发最大的宽容。但是到目前为止, 基督徒一直就是全人类中最不宽容的” (Voltaire 485)。“自相残杀的暴力是基督教历史的标志” (雅各比 45)。在《黑暗的心》中, 库尔茨作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者在非洲横征暴敛、滥杀无辜, 他把那些不听话的土著人的头颅割下来, 摆在贸易站周围的柱子上做装饰。这种文明和野蛮的倒错颠覆了人们对两个世界的认知。作为西方文明的代理人, 库尔茨具备卓越的表达能力。他在写给“反对野蛮风俗国际协会”的报告中, 有一种“好象是出于庄严静穆的仁爱胸怀的, 异乎寻常的浩然正气。这就是雄辩的——辞藻的——火一般的辞藻的无边无际的威力。”但在报告最后的注解部分, 库尔茨却发出了“火一般热情的呼喊: ‘消灭这些畜生’” (康拉德, 《黑暗的心》65)。当代著名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1949-) 指出: “库尔茨是恶魔般的可怕化身, 他知道快感的秘密, 并因此恐吓、折磨他的主体, 并切断了他与通常的人类思想的纽带” (齐泽克 205)。有评论者认为, 《黑暗的心》中的情节不是靠真实或心理的地理位置变化来建构, 而是靠由一系列叙事站点组成的叙事图谱来建构。这些站点为马洛的叙事提供支撑、媒介和停顿 (Williams 157)。这些站点都充满了死亡意象, 换言之, 它们之间依靠死亡联系在一起。马洛溯河而上的最终结果就是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库尔茨, 在库尔茨的临终话语中感觉到了主体内心深处的恶,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这似乎是整个故事情节的结束。然而, 叙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马洛继续他的寻觅, 他的叙事节点回到了英国本土, 他见到了在本土的公司经理、记者以及库尔茨的未婚妻。最后, 叙事组成了一个圆环, 复归在泰晤士河的船上听他故事的听众之中。这种叙事图谱实际上在暗示, 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 非洲和欧洲之间没有什

么必然的区别，对非洲的臆想反倒折射出欧洲人的无知和迷惘。在康拉德看来，残忍的暴行不是野蛮部落的行为而是库尔茨等所谓文明人的行为，文明与野蛮在广袤的非洲大地实现了逆转。

康拉德的《进步前哨》(*An Outpost of Progress*, 1897)对两个白人凯亦兹(Kayerts)和卡利尔(Carlier)在物质产品匮乏下的生存现实进行了夸张性描述。初到非洲时他们带着自以为是的满足接手了贸易站。遗落在贸易站的过期报纸成为贯穿于这部小说的讽刺符号。小说中描写了当时媒体所推行的“进步”话语对凯亦兹和卡利尔的影响：“报上有一篇题为‘我们的殖民扩张’的文章，里面尽是些高谈阔论，其中不少内容是宣传文明的权利和义务，宣传文明工作的神圣性，并为那些把光明、信仰和商业带给蛮荒之地的人们歌功颂德。”(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8)那些代表官方话语的报纸把野蛮的殖民扩张说成是神圣的文明，把侵略者说成是光明的使者，于是就会产生像凯亦兹和卡利尔这样自以为是的文明者：“他们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评价”(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8)。在“进步”话语的象征界中，他们形成了主体意识，然后带着“前理解”走上“进步前哨”，这是所有殖民者主体的心路历程。那些总是伴随着欧洲帝国主义在非洲所作努力的华丽辞藻在这里只能在旧报纸上呈现。那些精美的言辞掩盖了人们到非洲的真正理由，而且助长了他们的自大傲慢情绪，掩盖了这些“贸易和发展的先驱”在理想与事实之间的差异。小说在许多方面颠覆了对白人和黑人的传统看法。黑人在贸易站扮演着实际的管理者角色，而白人带来的却是灾难而不是进步。他们是欧洲理想主义的产物，在贸易站，没有黑人的帮助，他们几乎不能生存下去。对他们而言，周围的森林不可穿越，别人的话语他们无法理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为白人不屑一顾的土著人适应和控制环境的手段都是凯亦兹和卡利尔无法想象的。在《黑暗的心》中，库尔茨传播文明的远大理想使他在非洲发出了“消灭一切野蛮人”的叫嚣，卡利尔也赤裸裸地表达了他的远大理想：“只有斩尽杀绝所有的黑人，才能使人在这个国家待得下去”(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19)。

耶稣本来代世人受过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由此也成了拯救与爱的隐喻。而凯亦兹吊死在十字架的样子却是滑稽可笑：“双臂直挺挺地下垂，似乎僵硬地站在那儿立正，但是那发紫的半边面颊滑稽地贴在肩膀上。大不敬的是他发肿的舌头吐向那位常务董事”(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27-28)。象征理性与文明的基督教精神遭到了凯亦兹的戏弄，这也揭示了其深层次的荒谬性。凯亦兹的荒谬表现在他“误读”了十字架的“真正”功用，把它当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帮人脱离尘世喧嚣和烦恼的工具。与之前的作家相比，康拉德不仅描写了殖民者给殖民地带来的苦难，更是重点突出了殖民者的异化过程以及黑人表现出的克制和能力，从而曲折地表达了殖民政策给西方带来的消极影响。

因此，很多作家通过对英帝国在非洲殖民过程的描述，展现出殖民者以文明教化的名义对外进行疯狂掠夺和残酷镇压的殖民谱系。在这些作品中，那些建构殖民主体的话语慢慢地失去了权威性，反倒成了毁灭主体的帮凶，相伴而来的各种努力也都无果而终。

结语

通过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非洲殖民谱系的分析及其在文学中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出，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与非洲原始土著之间不存在正常的来往，他们在对土著的看法中主观地增加了野蛮和混乱的色彩。当他们深入非洲深处时，他们就会发现淫乱、杀戮、吃人和邪恶崇拜，同时他们也会发现长期在非洲的库尔茨似的白人殖民者已经成了黑暗大陆的一部分。在英国国内，由于当时种族主义所代表的阶级日渐式微，帝国主义话语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种族话语，阶级和种族之间的词汇变得可以互通，既存在着阶级等级，也存在着种族等级，二者都是社会或自然进化的结果。作为帝国话语的一部分，非洲大陆的野蛮和混乱多半是维多利亚人的臆想。这种臆想是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即使反对殖民主义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种族差别的痕迹，他们笔下的非洲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方面映射出维多利亚人想看到的英雄、神圣的自我形象，另一方面也能暴露出他们内疚且倒退的魅影。这也表明了西方文化从根本上就是就带有种族色彩的，种族平等只是一种乌托邦话语而已。

Works Cited

- Bakery, Samuel white. *The Albert N'yanza, Great Basin of the Nil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Nile Sources*, 2 vols.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1962.
- Blake, William. "The Little Black Boy", *The Poetry and Prose of William Blake*, ed. David V. Erdman.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 Brantlinger, Patrick. *Rules of Darkness: British Literature and Imperialism, 1830-1914*. London: Cornell UP, 1988.
- Burton, Richard. *The Lake Regions of Central Africa*, 2 vols. New York: Horizon, 1961.
- . *Two Trips to Gorilla Land and the Cataracts of the Congo*. New York: Johnson, 1967.
- Curtin, Philip D. *The Image of Africa: British Idea and Action, 1780-1850*.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64.
- Davis, David Brion.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 Ithaca: Cornell UP, 1975.
- Dickens, Charles. "The Noble Savage." *Household Words* 7. 11 June, 1853.
- 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Charles Markman. New York: Grove, 1968.
- Foucault, Michel.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Donald F. Bouchard. Ithaca: Cornell UP,

1977.

George, Rosemary Marangoly.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6.

Haggard, Rider. *King Solomon's Min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5.

Kidd, Benjamin. *Social 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894.

Lubbock, John.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Savages*. London: Longman, 1912.

Maugham, William Somerset. *The Explorer*. New York: Baker & Taylor, 1909.

Reader, Winwood. *Savage Africa: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Tour in Equatorial, Southwestern, and Northwestern Africa*. New York: Harper, 1864.

Russell, Bertrand. *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6.

Southey, Robert. *Poetical Works*, Vol. 2. London: Longman, 1938.

Stepan, Nancy. *The Idea of Race in Science: Great Britain, 1800-1960*. Hamden: Archon, 1982.

Voltaire, Francois.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Trans. Peter Ga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2.

Williams, Jeffrey. *Theory and the Novel: Narrative Reflexivity in the British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Zagorin, Perez. *How the Idea of Religious Tolerance Came to the W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3.

康拉德, 约瑟夫: 《黑暗的心》, 薛诗绮等译。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年。

[Conrad, Joseph. *Heart of Darkness*. Wuhan: Changjiang Art Press, 2006.]

——: 《康拉德小说选》, 袁家骅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

[—. *An Anthology of Conrad's Fiction*. Trans. Yuan Jiahua.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1985.]

齐泽克, 斯拉沃热: 《幻想的瘟疫》, 胡雨谭等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

[Zizek, Slavoj.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Trans. Hu Yutan. Nanjing: Jiangsu Renmin, 2006.]

雅各比, 拉塞尔: 《杀戮欲》, 姚建彬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年。

[Jacoby, Russell. *Bloodlust: On the Roots of Violence from Cain and Abel to the Present*. Trans. Yao Jianbi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3.]

责任编辑: 张连桥